

在哲学性与科学性之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反思

杨兴林^{1,2}

(1.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讨论为切入口,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以后由卢卡奇等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由政治、经济批判转向了哲学和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工具理性批判和批判理论的发展而臻于成熟,由于它以抽象的大写的主体置换了现实的具体的革命主体,所以导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越来越脱节,并使其主体性哲学批判和异化批判的文化批判特色越来越暴露出来。尽管如此,它为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2)04-0010-05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专业学科和专门论域的形成,缘起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了解 and 回应这种特殊的思潮的政治需要。虽然自这门学科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最基本的问题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对其性质的争论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其理论精神实质和逻辑进路的理解;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争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外延得到了清晰地界定,相关的学科群也得以兴起。撇开这个已经达成的共识不谈,作为一种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转向文化和哲学批判,它的逻辑效应又如何,学术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多还是从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概念史的角度进行的,而这种做法是很有问题的。本文就从元评论的视角入手,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中轴,还原其最初的历史情境,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审理。

一、“元评论”视角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虽然作为一种效果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将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学术事实,但是佩里·安德森当初做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定

义却获致了国内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1]117}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1]60-61}总的来说,安德森的这个定义确实已经非常之全面了,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时间和空间/地域上的限定,而且还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主要成因,并且认为“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1]41}。作为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中坚人物,安德森的这些富有同情和批判性的评论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没有更进一步揭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逻辑变迁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经验变化(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来说才是重中之重。

对于解释问题本身,必须采用“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的方法,因为“关于解释

收稿日期:2012-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KS065)

作者简介:杨兴林(1981—),男,内蒙古通辽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2]34}作为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传统和借鉴了其理论资源的思想家,詹姆逊提出的这种元评论的理论诉求对于我们用“深层历史解读法”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詹姆逊在《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或者说其“死亡”抑或“危机”都恰与资本主义得以重建和得以极大扩展的那些时期同时发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对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加以理论化”^{[3]310}。还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这些新的维度主要包括:

首先,世界范围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一点是最明显不过了,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名权最初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打压下而被迫授予的。“十月革命”的成功犹如“雄鸡啼鸣”,在斩断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的同时,也造成了东西方之间革命形势的分野。正是这种宏观背景下的历史格局促使“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之间发生了一时难以弥合的分裂。也正是这一点直接成为第二国际内部分裂的诱因,使“两个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之间关于政治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再次提到桌面,但是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展“布尔什维化运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流派,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并被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4]72}，“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顶桂冠就是在这种逆反性的逻辑下发轫的。

其次,最为基础性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实际变迁。19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对其自身来讲是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由科学管理革命所引发的资本的组织方式的合理化;继泰罗制的管理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普遍地推广了福特制的生产模式,福特制下的大规模生产不仅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转变为促使资本进行再生产的“消费者”;

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干预性和经济政策的纠偏性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和效力,甚至于在早期卢卡奇那里就做出了“计划经济”的观念已经进入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中的结论^{[5]125},后来的哈贝马斯也批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能够考虑到“危机理论的预测,不仅能够决定无产者决心进行革命,而且也能够决定资本家决心进行革命,这就是说,危机理论的预测使得资本家不断地用意志和意识去驾驭经济过程,并且,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也把合理化的因素引入资本主义自身中,而马克思认为,合理化的因素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6]351}

第三,西欧社会民主党团赢得的议会斗争的合法性,使工人阶级获得了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进行政治实践的可能性,恩格斯政治遗嘱中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斗争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工人阶级政党的“充分就业和福利”策略不仅使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就业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而且使许多左派人士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物化的奴役性问题^[7]。由此,与基本需求领域相联系的经济斗争不再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的主要斗争形式,“异化”失去了它的经济上显而易见的贫困的形态,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形式更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劳动者得到了很好的整合;并且随着“异化形式的多样化”,意识形态批判赢得了迫切性,批判就会首先在“文化”领域中而不是在所谓的基本需求领域中来寻求被否定和被颠倒了的需求的满足,它追随的“只是从趋势上看已经从劳动市场的经济机制过渡到了自由时间市场的社会心理机制诸种压制的力量;一句话,受操纵的文化消费,证明的也许只是一种以新的、无疑更优越的形式的旧的权力关系。”^{[6]17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批判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科学地解释世界这个认识论旨趣,更要有在批判世界的理论逻辑的观照下实现“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所以,作为一种致力于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的集体智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自己的思想、生命和个性全部灌注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主义而有了“头脑”,哲学也因为无产阶级而有了“心脏”。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那里,理论和实践还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综合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实践也因为有了理论而获得了思想史

的深刻意义。例如,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便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 1848-1849 大革命的分析 and 总结以及 1857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手稿之间的关联。

但是,作为检验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第二国际以后发生了分裂,这也是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长期面临着的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对这个危机的处理表现为 3 种策略: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列宁路线)^{①[8]}。作为把马克思思想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列宁路线,无疑地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产生了极大的思想触动和吸引力。但吊诡的是,与其主观意图相左,其论证和结论恰恰暗示了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列宁主义的非现实性。无论是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还是探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和弘扬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辩证法的维度。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主体是抽象的和非历史性的,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是一个漂浮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例: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标题就非常浓烈地表达出要为主体性和革命意志正名的特征。通过对辩证法的重新定义,卢卡奇引入了非直接的、中介的方法论,进而通过主客体的辩证法在理论上一举摧毁了修正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并且使作为生成的总体性(过程性)的历史成为一种本体论的规定性;这种本体论的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物化现象的生成。这种物化使商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物化结构又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对之进行批判和超越的物化意识。而要超越这种物化意识,恢复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则仰仗于体现了主客体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可以看出,卢卡奇眼中的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纯粹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的哲学透视。此外,葛兰西则从分析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异为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另外一番天地。他认为,在东方没有形成独

立的市民社会,整个上层建筑主要由政治领域组成;而西方社会则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资产阶级不仅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对于西方社会来说,革命的任务不是政治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文化霸权。葛兰西的这种论证不仅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合法性,即“反对《资本论》的胜利”并不是对“实践哲学”的否定,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敞开了方便之门。

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问题表现得更加清晰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把理性主义作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解构对象,从而期望为社会解放提供一种美学救赎的道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哲学研究纲领,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当中所表达的强烈的价值批判立场更加彰显出文化批判的理论张力,尽管批判理论本身产生于社会结构,但批判理论的目的不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在批判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及崩溃范畴是概念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的意义不应在对当代社会的辩护活动中寻找,而应在把当代社会转变成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中去寻找。”^{[9]208}霍克海默认为,“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正如相应于理论的社会不能叫做‘生产性的’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在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包括传统理论要素和普遍衰退的文化要素。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9]229}可以看出,尽管批判理论一再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但革命主体的衰退和消失已经作为一个默认的理论前提包含于其中了。这在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命意和命运中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否定的辩证法以绝对的否定和非同一性颠覆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根基,力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批判理论被彻底激进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也空心化了,成为只要是起来造反并且“造反有理”的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当事人。所以,当批判理论被激进的学生在 1968 年付诸实践时,阿多尔诺对此表示不可理解,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万没有

①其实,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理论努力很多时候也是在试图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却被后来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斥为修正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始作俑者。当然,这种指责不仅在理论立场上是有所问题的,在论证上也是牵强附会的并带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精神的论述很多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做出的论断。

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10]²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主体异化批判,弗洛姆的一个论述使这个判断得到了完全意义上的支撑:“历史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只作了一个更正。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的阶级,因此从异化解放出来必然要从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11]¹⁶⁷⁻⁶⁸ 试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功过得失进行总结并力图初步建构自己以交往概念为核心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哈贝马斯在他的早期著作《理论与实践》中做出了两个看似轻微实则具有转向性意义的结论:①马克思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一种明确地用政治观点设计出来的、同时在科学上又可以证伪的历史哲学;我们可以大胆地利用晚辈的机会说,我们能够比马克思更好地理解马克思”^[6]¹⁸⁶;②“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被理解为集历史哲学和革命理论为一体的一种学说,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它从分析异化开始,并以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实践的革命化为目的,以便消除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同时存在的全部异化。”^[6]³⁰¹ 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逻辑也发生了散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那里只剩下永不停息的批判,其理论内部又在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基础上演绎出不同的理论路向。

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反思

虽然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入手,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后却走向了批判性的认识论这条路线。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批判过程中越来越发现重新发明和发掘革命主体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无产阶级到人民大众^[6]¹⁷⁴以及工人阶级到“消费者”的形象转换,尤其是二战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民主党充当了“政治中间人”的角色并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部分^[12],使批判理论在实践进展上举步维艰而越来越内卷化为一种激进的学院内部传统。对此,我们今天该作何评价呢?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极大地丰富、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也许正是由于实践旨趣越来越无法实现,批判才会表现得如此之深刻和发达。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尚未言明、或者是还未来得及论证、或者是即使已经论证了但由于世易时移而不得不进行重新审视的命题和思想,都被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以补充、补白或者是倒转的方式而发展了,并且成为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自然与社会概念、人的问题、生产力的奴役(物役性)问题、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权威主义、文化工业,等等。

其次,它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出场路径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越来越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的理论追求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实践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通过历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实现了真正的哲学革命和思想史革命。“作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不再像过去的体系哲学那样,致力于并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思辨建构和自己的超越性,而是内在地要求超越自己的抽象性,与具体的实证科学研究相结合,成为研究现实的社会历史的方法指南……它还内在地要求超越自己的理论性,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相统一。”^[13] 通过消灭哲学来实现哲学是马克思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自身的方式,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产生了累累硕果,正是由于其源于哲学、归于哲学而又不拘泥于哲学的理论路径,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具体科学之间实现了真正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和良性互动。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并没有放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向精神求索开放的只有两条途径,我们的需要在那里分道扬镳,一条是美学,政治经济学是另一条”,詹姆逊引用过的马拉美的这句带有总结性的论述好像表明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相容的,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那里则不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大多自觉地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其理论根基。比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了他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的精心解读;特别是批判理论的掌舵人在就职社会研究所所长演讲中就强调,真正的问题是研究“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角色、该集团成员的心理结构转型与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集团成果并由集团成员所创造的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关联”^[9]²³⁰;即使是在后来向右转的哈贝马斯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背景及其当代进展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观照^[6]¹⁸⁰。而且,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其理论的每一步深入和转型都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支撑有关;其形成时期的乐观主义态度就是试图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十月革命”进行经济学论证的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和崩溃理论的直

接反映;学派中期即批判理论正式确立时的逻辑转型、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和悲观主义的革命预期则直接受到了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质性影响^[14]。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撑而较好地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变化,而且通过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的对话、借鉴和创造性挪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创新和延续。每当马克思主义遇到危机或重建时,无论是激活马克思那里或者是马克思之前的某个思想资源(比如回到马克思曾经超越了的康德或者历史辩证法的基地黑格尔哲学那里),还是借由当代西方的时髦哲学(比如,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等),都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蛹化。因为,西方哲学思潮也在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也要坚持思想、批判与社会存在条件之间的协调,遑论西方哲学思潮也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无论是采取价值中立,还是批判性立场)。所以,我们不仅要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实现与西方哲学思潮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与马克思之间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不正是在这种历史视阈的限制和不断突破中前行的吗?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意识到,“具体的历史限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开放性的物质保证,而对此的高度自觉则是其生命力的思想基础”^[15]。

最后,我们一定要谨记,作为一种被迫的理论选择,不能对其采取简单的观点对照和理论立场的外在批判。因为制造“阶级的退却”以及革命主体的衰落和消失的不仅是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背叛,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迁和自我调整的不可避免的理论产物^[16]。我们不能把所有不利的理论后果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句简单的判断都交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大师们,因为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恰恰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的浸透和渗透的结果”^{[3]315}。所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怀着虚心求教和敬意的态度,本着元评论的精神,“回到历史”,然后拷问“哲学何为”?

参考文献:

- [1]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高钰,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C]//王逢振. 詹姆逊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3]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新马克思主义[C]//王逢振. 詹姆逊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 科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 王南湜,荣新海,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6] 尤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M]. 郭官义,李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7] CHARLES T. Alienation and community[J].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1958(Autumn):11.
- [8] 胡大平. 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J]. 浙江学刊,2004(3):48-58.
- [9]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10] 特奥多·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M].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11] 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C]//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12] RALPH M.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J]. *The New Reasoner*, 1958(Summer):45-48.
- [13] 张亮.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J]. 江海学刊,2009(2):34-38.
- [14] 张亮.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J]. 天津社会科学,2009(4):23-27.
- [15] 胡大平. 走出“后马克思主义”悖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及其启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88-93.
- [16] 胡大平. 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批判的逻辑转向和意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138-150.

